

陆路丝绸之路：凝聚共同的历史记忆

□ 周诗茵

2000多年前，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并为西域商人制定贸易的规则和建立管理的体系。一条经河西走廊、通向帕米尔高原以西的贸易通道——陆路“丝绸之路”由此诞生。沿途各地的商人们努力地突破不同语言的隔阂，克服广袤地域的阻碍，探索更多更大的市场。果蔬、药物和香料是陆路丝绸之路中最重要的几样商品，它们跟随商人们的脚步，进入更多部落、民族与种族的生活与劳作空间。

（一）

罗马、阿拉伯、印度和中国都是陆路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在欧洲的罗马，商人们把金银、玻璃、珊瑚和精油当作“货币”，从东方换取纺织品、香料和染料。于是他们就可以在晚宴上穿戴薄如蝉翼的东方丝绸，品尝珍贵的东方食材，彰显自己富裕的生活和新贵的身份。在西亚古都巴格达，由于从北至南、由西向东的商路都汇集于此，这座都市繁盛了数百年之久，经济与文化水平都达到同时代的高峰。当人们的收入增多，他们就开始喜欢使用各类奢侈品，只不过不是现代有钱人热衷的法国皮包、意大利跑车，而是丝绸、珍珠、翡翠和香水。在南亚的印度，为了换取胡椒、象牙和纺织品，许多罗马货币经从这里流入贵霜——月氏国游牧部落从塔里木盆地迁出后在波斯东部建起的一个颇为富裕的帝国。中亚的粟特商人擅长四处招揽生意，比起绫罗绸缎和金银饰品，他们更喜欢交易亚麻、皮毛、藏红花、胡椒和樟脑这些实用的东西。在东亚的中国，既有不少活跃的私商，也有较为成熟的官方贸易。尽管古时的旅行都颠簸不易，商人们还是觉得在中国行路更踏实放心一些。商队有时会携带琳琅满目的货物，与使节结伴出行。典型代表是汉唐的丝绸制品和宋明的茶叶、瓷器，它们在中国以外都是既难得又实用的佳品，很受欢迎。丝绸滑润好看、优雅美观，无论自用还是送礼都是很好的选择；饮茶安全又易消化，还能提神醒脑、防寒保暖；瓷器不仅是高级的用餐工具，更是重要的艺术收藏



《清明上河图》（部分），图中的“刘家上色沉檀樟香”店铺，就是一家香料店。

品，在法国和德国最时髦的巴洛克宫殿里，至少都有一间装饰得满满当当的“瓷器屋”。这些商队返回中国时往往也满载而归，他们不仅带回宝石、皮毛等名贵的产品，还有牛羊、驴骡、骆驼等成百上千头的牲畜，以及洋葱、黄瓜、香菜、石榴、开心果和银杏等异域果蔬。

自从陆路丝绸之路开辟以后，中国内地与西域间的商业往来虽然时强时弱，但是一直都在持续进行。今天，我们还能从“胡桃”“胡椒”“胡萝卜”等名称中直观地了解到，这些餐桌上最为常见的食物是从西域传入中土。就连我们最为熟悉的小麦也是远道而来，然后再被逐渐驯化，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西方，英语中的“野菜”“菠菜”“茵陈蒿”“橘子”“糖浆”，还有法语中的“酱油”“港口”“盐税”“关税”“百公斤”等词汇，都是中世纪时由意大利人从阿拉伯语转译而来。其实，陆路丝绸之路上的买卖双方不见得弄得清手头货品的准确地理来源，他们更关注货物的品质与价格——水果是不是美味可口？药品有没有货真价实？香料转手倒卖能不能划算？商人们还愿意付出一定劳力和

金钱去保养、修补道路，并定期举办盛大的“集市”。这些集市和本地小规模的市场不同，它们想要吸引来自远方客人的注意，而不是只顾及本地居民的需要。为此，它们可能会有意识地为潜在的客户安排一些安全的保障、公共的服务和特殊的权益。

（二）

既然彼此要做生意，来自不同地区、属于不同种族、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就不可避免地频繁接触。他们有时擦枪走火、剑拔弩张；但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却是常常和平共处、来去自由。在这个本为商贸而开辟的交通网络上，各种语言、观念和习俗都有可能找到生存与争论的空间。它们甚至可能彼此借鉴，形成新的思想，进行新的实践。

这种思想的丰富性在11世纪的维吾尔族长诗《福乐智慧》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用诗歌的语言忠实而优美地记录着自己在陆路丝绸之路上的所见所闻：“你瞧，从空中飞来天国的鸟儿，一些是印度的罗闍，一些是凯撒的使臣。”“有的从东方带来珍贵的礼品，有的从西方赶来，献一片赤心。”这部作品的目的是劝诫统治者追求正义、培养善德。为了能够说清这个道理，它将维吾尔人的文化意识、古希腊的政治哲学、阿拉伯的伊斯兰精神和中国的伦理智慧融为一体，就像一部“文明融合的活化石”。

（三）

即使在进入大航海时代后，陆路丝绸之路依然是东西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欧洲殖民者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掠夺人口、贩卖奴隶，几乎“一夜暴富”。有钱之后，他们还是喜欢丝绸、瓷器等各种来自亚洲的奢侈品，对胡椒、豆蔻、生姜这些香料的需求量也变得更大了——它们不但可以提升食物的味道，还兼具药用的价值，能帮助缓解感冒与肠胃不适的症状。

在意大利，无论大城市还是小镇都想把香料和药品转运到更西、更北的欧洲，好从中赚取高额的利

润。据说，达·芬奇、拉斐尔和提香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了不起的成就，也与当时意大利诸城进一步扩大与亚洲的贸易不无关系。他们由此接触到色彩更加丰富的颜料，且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等城中的那些艺术的赞助人——教宗、主教、贵族、政客和商人，也积聚了雄厚的财力，负担得起这份开销。在17世纪的印度，沙·贾汗痛失爱妃，为她用纯白色的大理石建成一座“泰姬陵”。这座美丽的陵墓以数不清的黄金和宝石为装饰，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至今仍是全球闻名的旅游胜地。它不仅向世人展现出一位伤心的丈夫多么怀念妻子，也充分说明当时的莫卧儿王朝统治者受益于亚、欧两地间的繁荣商贸，是怎样的富有和奢华。

（四）

陆路丝绸之路上的果蔬、药物和香料曾让东西方的人们都能享用营养更丰富的饮食，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审美趣味因此得到改善，知识更丰富、眼界更开阔。在这条迎来送往的商路上，勤奋的劳作、灵活的体制和开放的竞争曾创造许多奇迹。沿线有不少城市拔地而起，它们有的积聚起惊人的财富，有的扩张为强盛的帝国。心态的开放与利益的共享是这些商贸中心的成功秘诀。在数百上千年间，它们一直都联系在一起。

文化的昌盛常与经济的繁荣如影随形。当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和交融，就有可能在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不斐的成就，留下《福乐智慧》这样瑰宝般的作品。那位智者生活在千年以前的喀什，他尊重知识与荣誉，心怀治国的理想，并且渴望幸福的命运，这与今天的我们是何其相似。



慈善信托既指慈善理念的信托实现方式，又指信托制度中以慈善为目的的形式，因此，慈善和信托是不可分割的。构成信托需要有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者之间存在伦理关系、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良好的慈善信托应是因道德而生发、因法规而完善、因互信而持久。一个诚信社会需要鼓励委托人的慈悲之心，促使受托人做好利他之举，培养受益人有感恩之情。

（一）

合理安排财富是慈善行为的动因之一。把一部分财富分割出来，用信托的方式世代管理这部分财富，从而实现施惠他人的目的，这种理念其实早就深植于中国历史传统。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义庄制度，尤以范仲淹家族的义庄最为悠久。

范仲淹在壮年功成名就之后，处理自己的财富可以有很多选择，同时代的多数人都购置乡产，自己养老的同时又为子孙留下基业。范仲淹的弟子也劝他建造豪门大宅以供自己养老，但是他没有选择这些做法，而是开创性地置田数百亩为义庄。范氏义庄自1050年开始设立，到20世纪中期衰亡。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尽管王朝更迭，战争连绵不断，但范氏义庄一直存在，堪称世上较长的共有财产之一。范仲淹在晚年捐出大部分田地时，还专门挑选本族内孝贤子弟作为这种慈善事业的受托人，参与管理，并列出了13条规则，有人有规，有章有法，成了中国历史上慈善信托的标志性事件。研究范氏义庄的汉学家将其定义为“一个以宗族名义持有的信托财产”。

（二）

到了近代，义庄这种传统制度也开始注入西方信托的色彩，最早中西合璧的义庄，当属盛康和盛宣怀父子创设的“拙园义庄”和“愚斋义庄”。作为当时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和曾经的红顶商人，盛宣怀思想开放，愿意接受新事物，功成名就后一直热衷办洋务，他经营愚斋义庄，既沿用了中国义庄制度传统，又融合了英美国家流行的信托理念。在生命最后时刻，他留下遗嘱，甚至将一半财产捐赠出去作为慈善基金，数额巨大。

可惜的是，盛宣怀作出决定太晚，没有来得及合理安排受托人。盛宣怀临终前捐出一半家产的意愿是明确无误的，只不过是遗言的方式而非落实在书面上的遗嘱，这就给身后的家族纷争埋下隐患。他指定的律师团队仅为清理他的庞大财产就花费了整整一年时间，之后设立了信托，规定了义庄董事会作为受托人，受益人是社会的穷困者。这本来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慈善信托事业，但是在经营几年之后，随着遗嘱执行者庄夫人的去世，作为义庄受托人的盛宣怀后人，由于家族争斗修改了原定规则，盛宣怀这个委托人的意愿没有被忠实执行。

相比之下，在盛宣怀之后，金融资本家何东捐给慈善事业的钱要少得多，设立的信托基金只是何东巨额财富的零头而已，远不及盛宣怀用一半财产来做慈善。但是何东在设立遗嘱上面下了功夫，他研究过世界上成熟的信托基金案例，也找对了受托人，就是汇丰信托。

慈善信托的历史文化

□ 车耳

汇丰信托在之后的多年中恪尽职守，谨慎投资，保护不断增大的本金，只用经营收益去做慈善，无论其影响和规模都远大于盛宣怀。

无论慈善信托还是公益信托，都是利他性质的。受托人在实现委托人慈善和处理其财富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受托人不能有私心。

（三）

中国传统的感恩教育是现代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在古代，很多未开化之地在儒家的教化之下发生了改变，被教化的民众懂得了感恩的意义，并把回报社会的理念传之后人。在现代社会，民众既需要良心的教育，还需要法制教育。

在慈善信托这件事上，如果委托人缺位，基于道德力量的第三次分配就会缺乏原动力；如果受托人缺位，执行力不够，就无法形成慈善的社会风气；如果受益人感恩之心缺位，公益慈善的热心就会下降，慈善事业无以为继，劣币就会驱逐良币。

和政府扶贫不一样，民间慈善事业是自发的，源于同情而不止于同情，出自怜悯而不尽是怜悯。培养个人的荣誉感以及自尊心，既能让奉献者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又能让受益人有不吃嗟来之食的志气。个人应有公益意识和利他之举，社会要有慈善环境，这样，现代慈善信托事业才能持续地进行下去。



四为句碑巍然耸立于张载祠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照耀古今，震烁中外。1956年，以关学余脉自任的于右任为关中弟子严协和《孝经白话注释》作序时，慨然于文化承续，慨叹于精神不朽，挥毫题写“四为句”。尔后，题字被镌刻于张载祠东厢房壁上，后又勒石刻碑，立于碑廊之中。北宋大儒张载创立的以“四为句”为精髓的关学思想，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出古代仕宦群体高尚的自我道德要求和高远的人生境界追求。

张载一生治学从仕，践履“四为句”，“思虑忧患以经世”，秉承担当敢为的精神，探索公平之法，期望利济天下，建立“太平”之世。

张载主张“为天地立心”，所立之心为“道心”。他认为北宋贫富不均、财政窘迫、外族入侵、积贫积弱，根本原因不是财政、经济、外交问题，而是“三代道失”。儒家文化主体地位丧失致使人心失“道”，民心散佚，整个社会缺乏文化认同与砥柱担当。在其学宦生涯中，学宦相长，期望为天地人重建伦理道德价值系统和秩序，即“道心”。嘉祐二年（1057），张载进士登第后，近十年间，相继在祁州（今河北安国）、云岩（今陕西西川境

内）、渭州（今甘肃平凉）任职时，积极探索以礼为教、因礼设规的文化治理途径。他认为“知礼成性”，可以“变化气质”，人内尊礼义，而外循礼仪，可以立“道心”成善治。因此，在地方官任职中，他以礼化俗，“敦本善俗”，积极推行仁政，定期举行乡饮酒礼，推广家礼，重视孝道，表彰懿行。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需要才哲之士，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了张载。张载以“渐复三代”的政治构想，得到宋神宗赞赏。宋神宗拟派其到军政枢要部门任职。张载认为对新政了解不够，辞谢不就，后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

张载殚精竭虑“为生民立命”，认为“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不管是主政还是辅政，他积极践行“足民”思想，认为富民是治民和教民的前提。熙宁元年（1068），蔡挺知渭州时，张载升为著作佐郎。当年渭州发生霜旱灾害，年

张载治学的四为句

□ 柯 昊

成歉收，饥荒严重，官府赈济远不能满足百姓借贷。张载竭力劝服蔡挺，取出十万军备物资救援灾民，并直接从当地人中选拔戍边士兵。在张载的努力下，边塞地区的民生得以改善。任职崇文院校书期间，王安石拟征用张载参与新政，交流时却政见多有不合。在变法问题上，张载肯定王安石推行变革的主张，但却不同意其“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的“顿变”，认为应该施行“以经界为急”的“渐变”。他认为变法应该“神而化之”，授民以土，在解决民生基础上，通过“渐化”来“通其变”，贵在简政精一，一以贯之，使民众逐渐适应，稳步发展。他认为“顿革之”，“欲民宜之也”，太急功近利，会繁苛苛冗，政令频出，反而让民众不知所从，不能安心生产生活。之后，张载被派往浙东处理苗振案后，托疾辞官，复归横渠镇。在为学慎思之中，他升华了“足民”思想，提出闪耀着熠熠人文光华

的“民胞物与”思想，将源于血缘的仁爱扩充至宇宙。

张载自幼尚学，有“为往圣继绝学”之志。他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北宋时期，“儒门淡薄”是主流思想文化界的状况，佛、道关于宇宙、本体、鬼神、生死的严整思想体系给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带来严重危机。张载少时“志气不群”，存边患之忧，有报国之志，喜好研究兵法。在拜谒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时，他接受建议，转而攻读儒家经典《中庸》。研修《中庸》数年后，不能明白晓畅，遍读佛学、道家之书，仍觉窒碍不通，又复归儒家经典，如此十余年，终悟出以儒为体，兼融佛、道的学说体系。在被宋神宗征召时，已经“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从仕期间也从未断辍学问，建立了“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熙宁三年

（1070），张载归居横渠，“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此后六年间，“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将所思精髓撰作《西铭》《东铭》，书于学堂双闼之上，教授关中学者。熙宁九年（1076），他“道益明，德益尊”，学问臻于成熟，结合历年所思，建构起囊括天地宇宙、政治伦理的系统思想体系，撰写成《正蒙》万言，又撮其要编成17篇。

张载矢志追求“为万世开太平”。他认为，“太平”之世是以“公平”为内在价值的“均平”社会，井田、封建和宗法从经济、政治、社会层面形成一体化的制度体系，是实现“太平”社会的制度保障。熙宁三年（1070），张载归居横渠后，开始“井田”实验。他与学生购田一方，按照《周礼》，划分公、私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疏通东西二渠，“验之一乡”。通过实验，他的政治思想更为成

熟。熙宁八年（1075），撰写成《井田议》，准备上奏皇帝，力争推行全国。熙宁十年（1077），秦凤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上奏神宗召张载回京任职，张载再次获得施行政治理想和主张的机会。他获任同知太常职务（礼部副职），但入朝后讨论礼制与有司不合，遂罢官归乡，途中溘然长逝。

熙宁九年（1076），张载弟子“蓝田三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深受其以礼为教、笃行践履思想影响，作《吕氏乡约》，在关中地区推行，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公约，后又突破地域局限，推行全国。张载学宦相长的生命历程中，使儒学承古萌新，奠基理学，创建了与谦、闽、洛鼎立的关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厥功至伟。同时，他也勇于践履，“造道”民间，使礼教进入百姓日用之中，对传统乡村自治模式和家国一体社会结构的形成影响巨大。时至今日，“四为句”具有的民族文化精神得以继承，其中所包含的个体生命对宏大时代主题的担当作为更值得学习。

人物志